

張覺述作集

现代汉语规范指南

(修订本)

张 觉◎编著

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我将自己的作品集命名为“述作集”，即源于此。不同的只是，我虽然好古，却信疑参半，所以于“述”之外又不免有所“作”。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張覺述作集

现代汉语规范指南

(修订本)

张 觉◎编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汉语规范指南 / 张觉编著. — 修订本. —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7.4
(张觉述作集)

ISBN 978-7-5130-2426-6

I. ①现… II. ①张… III. ①汉语规范化—指南 IV. ①H10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69240号

内容提要

本书是一部具有工具书性质而便于查检、阅读的现代汉语论著。它以简明、实用、有效为编写原则,以权威性(依据国家标准与学术界的共识)、学术性(系统地阐明基本知识与术语,论述有关学术问题)、资料性(收罗各种国家规范和有用的语言材料)与实用性(阐明各种规范以供遵循,辨析各种错误以供借鉴)为特色,深入浅出地论述普通话发音、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范汉字和繁体字的对应关系及正确使用、数字和标点符号的用法等问题,兼及简明扼要的语法规则介绍。它不但对青少年学生的言谈、书写与应试有较大的帮助,而且能有效提高广大教师、编辑、记者、作家、研究生的语言文字素养,对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也具有较大的学术参考价值。

责任编辑:江宜玲

责任校对:韩秀天

封面设计:张冀

责任出版:刘译文

张觉述作集

现代汉语规范指南(修订本)

张觉 编著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网 址: <http://www.ipph.cn>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外太平庄55号

邮 编:100081

责编电话:010-82000860转8339

责编邮箱:jiangyiling@cnipr.com

发行电话:010-82000860转8101/8102

发行传真:010-82000893/82005070/82000270

印 刷: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各大网上书店、新华书店及相关专业书店

开 本:720mm×960mm 1/16

印 张:38.5

版 次:2017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字 数:630千字

定 价:128.00元

ISBN 978-7-5130-2426-6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张觉二〇二二年四月二日于南翔白金院邸（张凌云摄）



张觉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古典文献和汉语言文学。

已由21家出版社出版著作45种，主要有《韩非子导读》（巴蜀书社1990年版）、《白话搜神记》（岳麓书社1991年版）、《韩非子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商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吴越春秋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论语〉〈孟子〉精华译评》（中国旅游出版社1993年版）、《荀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曾巩散文精选》（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潜夫论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常用成语词典》（黄山书社2000年版）、《〈孟子〉句式变换释例》（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现代汉语规范指南》（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年版）、《〈韩非子〉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韩非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商君书导读》（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9年版）、《韩非子：帝王的法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韩非子校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张觉述作集》（已出书目见封底勒口，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其中《韩非子校疏》于2011年荣获第十四届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奖一等奖。

此外，已在《文史》（北京）、《中华文史论丛》（上海）、《中国文化研究》（北京）、《汉学研究》（台北）、《孔孟学报》（台北）等131种刊物上发文316篇，并完成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韩非子》微观研究”（批准号：04BZX031）和《吴越春秋校证注疏》（批准号：13BZW092）、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重点科研项目《韩非子校疏》（批准编号：0314）和《商君书校疏》（批准编号：086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韩非子〉考论》（批准号：10YJA720041）的研究工作。

现正在从事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重点项目《潜夫论校笺注疏》（批准号：14ZS079）的研究工作。

述作集自序

人活在世界上，有的地位甚高，身价不菲，但终其一生，其价值仍然可以用单一的经济尺度去衡量——一辈子赚了多少钱；有些人的人生价值就不是单用金钱所能衡量的，这就是古人所谓的“不朽”。据《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范宣子问叔孙豹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叔孙豹回答说：“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祧，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①由此看来，人的政治生命与其生理生命同样脆弱。从政者即使能显赫一时，但随着其心脏停止跳动，其政治生命也往往就此结束，而不可能不朽。诚然，就是在古人心目中处于领先地位的“立德”“立功”，我看其对后世的作用也有限。据杜预、孔颖达的注疏，所谓“立德”，是指黄帝、尧、舜之类的圣人“创制垂法，博施济众，圣德立于上代，惠泽被于无穷”；所谓“立功”，是指禹、稷之类的贤人“拯厄除难，功济于时”^②。这些圣贤，虽然因其功德而名垂青史，但其功德也不过是让后人缅怀而已，由于时代的变迁，他们创制的东西早已不再有什么实际的效应了。这种情况犹如司马迁所感叹的那样：“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③

在我看来，最有不朽效应的应该是“立言”，因为如果能“立言”于世，则可以永远使后人在学习中获益。诚如魏文帝曹丕之《典论·论文》所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

①②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十三经注疏》，第1979页。

③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世界书局1935年影印本《四史》，第333页。



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①

的确，人在世上走一回，唯有给社会留下一些不朽之作（视野再开阔一些，应该说给社会留下一些永远值得后人利用的东西），其生命才有意义；否则，其存在与否也就无足轻重了。因为一个人寿命再长也终有尽头，其生前的工作即使十分辉煌而取得了莫大的荣誉，赚的钱、积累的财富即使无与伦比而惠及子孙或他人，到时候也会被历史涤荡殆尽，至多只能让后人感叹一声“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而已^②；一个人唯有留下一些能不断重印的传世之作，才能做到老子所说的“死而不亡者寿”^③。于是我深深地体会到，只有文化、经典之中蕴涵的精神方面的东西才具有强大的不朽的生命力，而躯体、财富等物质的东西是多么地微不足道，如果借用以往的学说名称，这应该是一种科学的“神不灭论”和“灵魂不死论”吧。正是受到这种传统思想的影响，我才“贱尺璧而重寸阴”，身处贫贱而仍加务于著述。

但是，曹丕所说的写文章也好，今人所说的著书立说也好，与“立言”诚然是不能画等号的。试看今日之世界，文章浩瀚如海，图书堆积如山，其作者都能算作“立言者”而不朽么？显然不能。因为如今大量的文章与图书不过是印刷垃圾而已。历史是最公正无私的评判者。只有通过历史的冲刷而流传不衰反复重印的著作才是不朽之作，只有贡献了传世之作的人才能永远活在人间。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才甘心久坐冷板凳，常泡图书馆，长年累月孜孜矻矻，不遗余力精益求精，其目的无非是想使拙著赢得读者的青睐而久传于世。

据孔颖达的说法，“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老、庄、荀、孟、管、晏、杨、墨、孙、吴之徒制作子书，屈原、宋玉、贾逵、杨雄、马迁、班固以后撰集史传及制作文章，使后世学习，皆是立言者也”^④。如此，则我虽然努力于著述，却又离立言者甚远。因此，我不敢将自己的作品集名为“文集”，而用

① 曹丕：《典论·论文》，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本《文选》，第720页。

②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版《宋词选》，第75页。

③ 《老子·第三十三章》，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缩印本《道藏》第11册，第484页。

④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其次有立言”孔颖达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十三经注疏》，第1979页。



了一个前人未曾用过的名称“述作集”。

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① 我将自己的作品集命名为“述作集”，即源于此。不同的是，我虽然好古，却信疑参半，所以于“述”之外又不免有所“作”。换言之，即既欲有所继承以集前贤之大成，又欲有所发明以成一家之说。窃以为唯其如此，方能使自己的作品受人青睐而不朽于世。诚如孔子所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② 治学不能不有所思考，有所创新，但思索却又必须以学习与继承为基础。所以，无“述”则学无根底，无“作”则学无所成。我之追求“述而又作”，即基于这样的认识。当然，我的这一追求也与自己的才智有关。如今很多人名流都是天才的创新发明家，所以他们能够“不述而作”，完成一个又一个重大课题，获得一个又一个大奖，这是我所无法企及的。

出版文集往往是大家的事。现在我出版自己的述作集，其实并不意味着要以大家自居。我出身贫寒，命运坎坷，一生贫贱，出版述作集本是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

1949年3月9日（农历二月初十）夜，我诞生于江苏省太仓县茜泾镇东街的倪家，这是当时我家借住的房子。平民百姓无家谱，所以大都不知道自己的老祖宗是谁，我家也一样。据我父亲的记忆，只知道我的曾祖叫张燕亭（1881～1944）。由于我父亲外出工作，我的童年是在祖父母的抚育下度过的，因此也受到了叔父的启蒙教育。正因为如此，我入学后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是，1965年我考取苏州高级中学后才一年，原本稳上大学的前途一下子就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改变了，“一片红”使我不得不带病回乡务农，十年青春就这样在贫困的挣扎中耗掉了。

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入南京大学，接着又考入复旦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但由于老家已分田到户，我还得花不少时间回家种地。为了彻底摆脱务农生涯而潜心于治学，1985年年初我毕业后放弃了在重点大学任教的机会，到了空军政治学院任教。哪知好景不长，1989年学院首长安排我转业到太仓县中学教书。为了利用上海的文献资料从事古籍整理与研究，我只好辞不赴命而下岗待业在家。在下岗待业还未成为社会普遍现象的当时，作为一家之

① 《论语·述而》，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十三经注疏》，第2481页。

② 《论语·为政》，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十三经注疏》，第2462页。



长，我所承受的经济压力、精神压力与种种坎坷恐怕是一般人所难以想象与忍受的。

为此，我穷而发愤，夜以继日，卖文为生，在待业的六年中发表了一百多篇文章，还撰写出版了《商君书·韩非子》（岳麓书社1990年版）、《白话搜神记》（岳麓书社1991年版）、《韩非子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商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吴越春秋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论语〉〈孟子〉精华译评》（中国旅游出版社1993年版）、《〈韩非子〉精华译评》（中国旅游出版社1993年版）、《白话商君书》（岳麓书社1994年版）、《荀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这些成果，虽然凝结着我身处逆境时的顽强、勤奋与心血，但我更要说的是，它们离不开出版界同仁的热情帮助与支持。岳麓书社梅季坤先生等满怀古道热肠鼎力相助的动人场景，一直浮现在我的眼前。正是他们的雪中送炭，点燃了我熬过严冬的希望，使我身处铁屋之寂寞而仍然不觉得孤独，从而支撑着我艰难而顺利地度过了那黑暗而冷酷的六年待业时期，同时又奠定了我的学术研究基础。

1995年，在空军政治学院石柏年政委的帮助下，我终于结束了待业生涯，转业至上海财经大学基础教学部任讲师，并于1996年任副教授。此后虽然忙于教学工作，但写书之兴趣与动力犹存，故丹青仍不绝于手，于是又有《曾巩散文精选》（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潜夫论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等新著问世。

人的希望或欲望大概总会随着适合其发展的条件而不断发展。1986年，发表一篇文章就已令我高兴万分。1990年，出版一本书会令我激动好一阵子。在那时，哪会萌生出版论文集或著作集的奢望呢？然而，书写得多了，也就有出版著述集的基础与愿望了。

我出版“述作集”的总体目标是：弘扬求真务实的汉学传统，力求内容形式的博雅完美，打造一丝不苟的文化经典和传世精品，以便使拙著成为今后研究《韩非子》《商君书》《吴越春秋》《潜夫论》《老子》《论语》《孟子》《搜神记》等传统经典及其他相关领域（如语言文字学、文学等）时不可不读的权威典籍而经久不衰。

出版“述作集”的夙愿已经开始成为现实，这当然是值得庆幸的。在此，我首先要向此前慷慨解囊而购置拙著的47万读者致以衷心的谢意，并希望继续得到更多读者的青睐与支持。因为经验告诉我，像我这种没有权势支撑而



处于“学术圈”之外的“草根学者”的学术生命^①，在过去或现在，主要还是靠广大读者维持着，而不可能依靠单位的经济实力去支撑。在将来，应该也是如此。“述作集”的出版，如果没有广大读者的热爱支持与慷慨解囊，也将难以为继。

当然，我也永远不会忘记祖父张瑞良（1902～1972）、祖母俞秀英（1909～1989）、父亲张永泉（1930～）、母亲林月娥（1929～）、叔父张永奎（1939～）的养育启蒙之恩与程千帆（1913～2000）、周斌武（1924～2014）等教授的精心栽培之德，如果没有他们的培养，就没有我的才学与成果。同样，我也不会忘记章培恒、严佐之等教授对我古籍整理工作的热情支持，不会忘记梅季坤（岳麓书社）、李立朴（贵州人民出版社）、倪腊松（贵州人民出版社）、李大钧（中国旅游出版社）、金良年（上海古籍出版社）、褚赣生（东方出版中心）、宋启发（黄山书社）、徐文堪（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吕健（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德明（岳麓书社）、郑明宝（上海古籍出版社）、江宜玲（知识产权出版社）等出版界同志先后倾注的厚爱之情以及吴格、刘一萍、钱振民、郭立暄、龚洁荣等先生在图书资料方面的相助之力，如果没有他们的热情帮助，我也不可能有这么多逐步积累而内容丰富的著作问世。还有，我也不会忘记我校科研处陈正良、干春晖等老师在科研资助方面的鼎力支持，不会忘记教育部考试中心陈睿、我校研究生院朱君萍等领导在工作方面的分外照顾以及朋友姜汉椿先生的热情帮助。

此外，我的同事龚敏，博士研究生黄吉辉，硕士研究生尤婷婷、郑兴兰、马静、吕佳、罗婷、吕佳妹、曹柳、何晓芬、刘雪莹、麻飘飘、张晓晔、付云鹏等也曾参与过部分工作，特此说明。

总之，我谨将这“述作集”奉献给一切爱我的读者、亲人、师长、同志、朋友、学生，并借此机会向他们致以由衷的感谢与诚挚的祝福。

但愿拙著因质量之有益于读者而流传久远，从而使我的感谢与祝福也与

^① 罗时进在《去除竞争性科研的幻影光圈》一文中说：“当学术权力得到部分回归后，用学术思维、学术方式、学术标准管理科研的期待并不能完全实现，某些具有学术影响力者以‘熟人社会’的处世行事态度介入各种学术性活动，包括科研立项、经费分配、成果验收、评奖鉴定，无不施其影响，如此则部分学科和学者资源累进，利益叠加，而弱势科研群体，即使具有精英素质，其学术表达和发展的空间也被大大压缩。”（罗文载《社会科学报》2012年12月6日第5版）我所谓的“草根学者”，恐怕是“弱势科研群体”中的主要组成部分。



日俱增，使后人能永远铭记爱我者的恩德，这便是我最大的幸福了。

如果说，我 25 年前下岗待业后卖文为生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话，那么现在退休后专心著述便可以说是“经济搭台，文化唱戏”了。前者的目标是经济，是利用文化以获取经济利益；后者的目标则是文化，是利用已有的经济基础打造文化精品。目标不同，结果往往也会不一样。当时，我为了生计而欲求卖文不已，所以也曾尽力制作精品以便招徕读者而不断获取稿酬，但毕竟没有像现在这样衣食无忧，以至于不求稿酬而只求拙著传世，乃至不惜工本地投入大量的精力、物力而从容著述。在当时，为了维持经济生活而写书虽然也在情理之中，但现在看来，财富等物质的东西与文化相比是多么地微不足道，只有打造经典才能使自己具有不朽的生命力。有鉴于此，我恳切地希望读者对拙著中的不当谬误之处多加批评指正，以使拙著不断完善而成为学习与研究中国文化者所必备的要籍。

最后，附自题二首^①，以与同道者共勉。

早年心慕高校洁，岂料身陷净土黑。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
贫而无谄常落寞，穷且发愤勤述作。笑看有司皆走肉，倾心拙著寄寥廓。
是为序。

张 觉

1998 年 5 月 29 日初稿于沪上五角场寓所

2008 年 6 月 23 日再稿于沪上四平路金轩

2011 年 9 月 21 日三稿于南翔芳林路院邸

2015 年 3 月 22 日修改于密云县溪翁山庄

^① 我在台湾古籍出版社 1996 年出版的《韩非子》后记中说：“忆及鲁迅有《自嘲》诗云：‘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甚似为仆为之。”但仔细一想，并不十分贴切，故于 2012 年 1 月 15 日另作此二首，诗成于松江泖港镇黄桥村浦江源温泉农庄。

再版前言

本书初版由汉语大词典出版社于2002年11月印行，可能是由于其简明扼要且兼具权威性（依据国家标准与学术界的共识）、学术性（系统地阐明基本知识术语，论述有关学术问题）、资料性（收罗各种国家规范和有用的语言材料）与实用性（阐明各种规范以供遵循，辨析各种错误以供借鉴）的缘故吧，当时所印的8000册在第一年就销售过半，没过几年就因为该出版社的撤并而绝版了，以致读者欲购而不得。读者需要的图书绝版虽然不是好事，但本书初版未重印，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却也不是坏事，因为我国的语言文字规范在这十二年中有了不少更新，该书初版的不少内容过时了。“十二”在我国是个大数，这可能源自一年十二月的自然现象吧，但结果连地支、生肖、星次、时辰、音律等都纳入十二的轨道中来了。春去冬来，十二月一晃而过；天道周星^①，十二年也一晃而过。如果比附于本书，则应该说十二年前的初版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在我们即将跨入新的一年之时，应该由其再版之修订本来承担新的历史使命了。

一说到“规范”，人们往往会有“死框框”的感觉，但世界上的东西往往是相辅相成的，这看似“死”的东西实际上却“活”得很。十二年来，我国的语言文字规范有了不少修改更新，如197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拟定的《中国人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有了更新版《中国人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GB/T 28039—2011），1983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出版局发布的《汉字统一部首表（草案）》有了更新版《汉字部首表》（GF 0011—2009）和《GB 13000.1 字符集汉字部首归部规范》（GF 0012—2009），1995年国家技术监督局批准、发布的《标点符号用法》（GB/T 15834—1995）有了更新版《标点符号用法》（GB/T 15834—2011），1995年国家技术监督局批准、发布的《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GB/T 15835—1995）有了更新版《出版物上数字用

^① 天道周星：庾信《哀江南赋序》中语。天道：自然规律。周星：指岁星（木星）运行一周天。岁星每年经过黄道十二宫（即十二次）中的一宫，约十二年绕天一周。



法》(GB/T 15835—2011), 1996 年国家技术监督局批准、发布的《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GB/T 16159—1996) 有了更新版《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GB/T 16159—2012), 如此等等。值得关注的是, 2013 年 8 月 19 日, 国务院在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公布了 2013 年 6 月 18 日印发的《通用规范汉字表》, 使我们的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又步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与我们国内的情况相似,《国际音标》也有了 2005 年修订版。

正是由于这种种新变化, 本书初版就需要进行全面的修订以及局部的重新编写。这再版与初版相比, 虽然不能说是面目全非, 至少也可以说是脱胎换骨了。唯一没变的只是当时的编写原则: 力求简明、实用、有效, 使其内容兼具权威性、学术性、资料性与实用性, 既讲清楚基础的理论知识与常用术语, 又阐明现代汉语及其书写符号的使用规范与常见错误, 以便有效地提高读者规范使用汉语的能力。要说明的是, 这次再版, 除了语音和书写(包括汉字、数字、标点符号的书写)等初版原有的内容根据新的规范和标准作了全面的更新修订外, 还加入了简明扼要的语法知识。这是因为考虑到现代汉语规范的主要内容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 而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的汉民族共同语, 既然如此, 则现代汉语规范也应该包含词汇规范和语法规则的内容。虽然现在国家发布的词汇、语法规则很少^①, 用不着我们在本书中花很大的篇幅去阐述, 但在日常生活中犯语法错误的现象也屡见不鲜, 因此, 用少量篇幅介绍一些实用的语法知识恐怕对读者也不无裨益。当然, 词汇乃至修辞方面的内容, 我想留待以后再增补, 以免这次修订的篇幅过大。

本书初版至今虽然已经十二年了, 但综览当今现代汉语方面的著作, 占主流的似乎仍然只有如下两大类: 一类是系统阐述现代汉语的高校教材; 另一类是为应试服务的中学参考书或高考辅导材料。前者往往只注重体系术语的建立而不注重实用, 有的甚至故意创造一些新的术语而使学习者苦不堪言, 而且除了那些编写年代较早的教材呈现出老化的现象, 近年编写的教材也程度不等地呈现出滞后的现象而未能与时俱进地阐述新近的语言文字规范。后

^① 似乎只有《普通话水平测试用普通话与方言词语对照表》《普通话水平测试用普通话与方言常见语法差异对照表》《普通话水平测试用普通话常见量词、名词搭配表》, 见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编制的《普通话水平测试实施纲要》(商务印书馆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者则多为应付高考而设计，注重散乱的题海探索而忽略了读者语文素养的全面提高。

在《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发出的“提升国民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提高全社会语言文字规范化水平”的号召下，在当今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形势下，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大学与中学的汉语教学，编写出能迅速有效地提高读者汉语水平的现代汉语读物。特别在如今计算机流行后提笔忘字乃至不会正确书写汉字的背景下，我们更有必要重视汉字教学，编写出能迅速有效地提高读者汉字书写水平的现代汉语读物。本书的编写和修订，就是在这种思想观念的指导下所作的一种尝试。

但是，可能是由于一般人对母语的掌握程度比较自信吧，所以对自己语言文字使用能力的提高似乎还缺乏足够的认识，近日我看到一套选修课教材的重印次数便透露出这样的信息。这是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2006年初版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中的《语文》（选修），该丛书中印刷次数最少的分册是《语言文字应用》，由此不难看出当代高中生对汉语言文字应用知识的学习兴趣已远逊于对文学文化知识的渴求。这恐怕就是人们要追问“如今大学生的母语能力怎么啦”的原因所在。

诚然，不要说是大学生，就是现在的硕士、博士，其语言文字的规范使用能力又比高中毕业生强多少呢？如果进一步追问，我们现在的公务员、作家、编辑、教师等，其语言文字的规范使用是否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呢？我们且不说过去某些刊物对名人书稿的咬文嚼字式的批评，只要您认真地读一下本书，将其中的语言文字知识与自己原本掌握的对照一下，恐怕就能发现自己的不足而不再盲目乐观了。为了使自己在日后的讲话、写作中免为方家乃至大众所耻笑，您恐怕还会爱不释手地反复阅读本书。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本书既是一面镜子，又是一部经久耐用的工具书。它一方面通过各种正确的语言文字知识和错误反例使读者对自己的语言文字使用能力有一个客观清醒的认识，另一方面又通过收录各种语言文字规范并进行解读的方式使读者能够反复查阅以满足日常汉语使用之需。

当然，学习语言文字知识比起学习文学来说可能有点枯燥乏味，但正如人们为了获得幸福而常常伴有辛劳的付出一样，老天似乎注定要给文化人预设这么一道不可绕过的人生之坎。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吧，掌握语言文字这一基本工具对从事文化工作的人来说显得尤其重要。正如我家



乡的谚语所说：“跌倒还能抓把泥。”意思是只要会种地，即使削职为民也还有活路。同样，掌握了语言文字这一工具，也就有了从事文化事业的基础。我之所以在1989~1995年的待业时期能卖文为生，无非是古今汉语这一工具帮助我打开了谋生的通道。我将自己掌握语言文字后所获得的益处说出来和大家分享，一方面是想加强读者对语言文字学习的重视程度，另一方面也希望读者能和我一样在掌握这一工具后有所获益。

其实，对于掌握语言文字这一工具的重要性，半个世纪前就有人强调过^①。邓拓在《共通的门径》中说：

其实，无论读书，做学问，进行研究工作，首先需要的本钱，还不是什么专门问题的知识，而是最一般的最基本的用来表情达意和思考问题的工具。这就是要学习和掌握语言文字和一般逻辑的知识。

如果一个人不会正确地运用语言文字，就很难谈到做学问、进行研究工作等问题，这是非常明显的。不能设想，一个文字不通的人，怎么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又怎么能够通晓各科知识呢？

语言文字这一工具既然如此重要，所以我们不能不加以重视。我衷心希望这本兼具工具书性质的现代汉语综合参考书不但对提高大中学生、留学生的言谈、写作与应试（如应对普通话水平测试、汉语水平考试等）能力有较大的帮助，而且对广大教师、编辑、记者、作家、研究生等的语文素养的提高也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当然，要达到这样的目的诚非易事。本书虽经全面修订，不当之处恐尚难免，我衷心地希望广大读者提出有益的改进意见，以便重印时修正完善，从而让本书在我国的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中作出更大的贡献，在提高读者的语言文字素养方面发挥更好的作用。

张 觉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三日
于北京密云县溪翁山庄

^① 下面的引文见马南邨《燕山夜话》（合集），北京出版社1979年4月新1版，第308页。邓拓（1912~1966）在1961~1962年以马南邨为笔名在《北京晚报》的专栏《燕山夜话》发表了不少杂文，同时又将这些杂文陆续汇集出版。《共通的门径》编为《燕山夜话》（四集）之第一篇，写于1962年。

初版前言

我在现代汉语的教学中，深感我们的现代汉语教材与一些关于现代汉语的读物有两点不足之处：一是理论性较强而实用性较差；二是落后于现实的发展。

所谓落后于现实的发展，一是指没跟上语言文字使用的实际需要。

例如，现代汉语中有后响复合元音韵母 io（“哟”“唷”的韵母），纯鼻音韵母 m（“姆”“噉”“旡”“姆”的韵母）、n（“嗯”的韵母）、ng（“嗯”“哼”的韵母），但现在的高校教材或介绍汉语的读物中都没有提及，而仍然死守着普通话只有 39 个韵母的“定论”^①。电视中的“才富大考场”节目也出现了这样的选择题：“现代汉语中有多少个韵母？A. 37 个；B. 38 个；C. 39 个；D. 40 个。”选手回答“40 个”，不但被主持人判为错，而且还说 39 个韵母是小学生皆知的常识性问题，弄得选手无地自容。其实，这根据学术界“定论”而拟的题目本身没有一个答案是正确的。

又如，很多人在使用繁体字时常闹笑话。像全国统一使用的初中一年级政治教材里的一幅插图，把林则徐用以自诫的横幅“制怒”（意为控制自己而不随意发怒）写成了“製怒”（意为制造愤怒）；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画挂历将画家爱新觉罗·溥佺的别号“松窗”（因其窗外有松树而得名）写成了“鬆窗”（意为松动的破窗），将红军的“长征”写成了“长徵”（令人莫名其妙）；还有范先生、沈小姐等在自己的名片上将自己的姓氏印成了“範”、“瀋”，令收名片者啼笑皆非^②。类似之例时见于刊物批评，但我们读了

① 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重订本（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5 年 6 月第 5 版）第 59～60 页说普通话韵母有 39 个；林祥楣主编的《现代汉语》（语文出版社 1995 年 12 月第 2 版）第 58～59 页列有《普通话韵母总表》，也说普通话总共有 39 个韵母；张斌主编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新编现代汉语》（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7 月第 1 版）第 39 页又说：“普通话语音共有 39 个韵母。”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编制的《普通话水平测试实施纲要》（商务印书馆 200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7 页仍然说：“普通话的韵母共有 39 个。”实际上，据《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 1996 年 7 月修订第 3 版），普通话中的韵母有 43 个。

② 此数例见香港《语文建设通讯》2001 年 6 月第 67 期所刊惠伊深的文章《由简变繁趣事》。



如今现代汉语方面的教材或读物，却并不能解决这种种问题。

落后于现实发展的第二个方面，是指没跟上国家语言文字规范工作的进程。

随着新时期我国语言文字工作方针的调整，国家有关方面发布了不少语言文字方面的规范，但如今有关现代汉语的教材或读物却往往缺乏这方面的详尽介绍与结合实际阐发的，以致很多规范不为人了解，因而出现了不少违反国家规范的说法和做法。例如，1997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布了《信息处理用 GB 13000.1 字符集汉字部件规范》，给出了“基础部件”（“末级部件”）560个，但2002年出版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新编现代汉语》第113页却还说：“汉字的末级部件650个左右，其中成字部件和不成字部件各300多个。”又如，国家有关异体字方面的规范，如今有些国家级的规范词典（如《现代汉语词典》）都违反了。还有，现在出版的很多拼音读物，其拼写都不符合《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的规定。

有鉴于此，我结合国家发布的各种语言文字规范编写了本书，一方面是为了给我校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提供一本语言文字规范化方面的教材；另一方面也是想为国家当前的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尽一份绵薄之力。全书着重论述普通话发音、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汉字书写与标点符号用法等问题，至于词汇、语法、修辞等传统内容，因为国家发布的统一规范尚少，所以不作系统论述。

本书的编写，以简明、实用、有效为原则，以系统地阐明规范、辨明错误为宗旨，力求使其内容兼具权威性（依据国家标准与学术界的共识）、学术性（阐明基本知识与术语，系统论述有关学术问题）、资料性（收罗各种国家规范和有用的语言材料）、实用性（阐明各种规范以供遵循，辨析各种错误以供借鉴），从而使本书成为一本兼具教材与工具书性质的综合参考书，以便使各种读者（如学生、教师、作家、编辑、记者等）都有较大的收获。当然，限于水平，不当之处恐也难免，在此恳请广大专家、读者不吝赐教。

最后，请允许我对徐文堪先生的鼎力支持、张万彬先生的热情赐教以及陈慧玉、杨莲生、周虹等老师在文献资料方面给予的热情帮助致以衷心的感谢。

张 觉

2002年5月29日写于五角场寓所

2014年2月15日修改于白金院邸